

# 俄罗斯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sup>\*</sup>

封 帅

【内容摘要】自19世纪60年代至今,俄罗斯与亚太空间互动的历史逻辑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亚洲国家眼中,俄罗斯是亚太空间的外来者。在俄罗斯自己看来,他们代表着欧洲文明向亚洲扩张的历史进程。“他者”的身份认同使得俄罗斯只能作为外部因素参与到亚太安全体系中。当俄罗斯国势强盛、综合国力凌驾于亚太国家之上时,它能够成为亚太安全体系的平衡者。但当国势衰微,在地区力量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时,俄罗斯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位置就将出现断崖式下跌,成为虽身处体系之中,却无法融入体系变迁进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式的边缘角色。俄罗斯参与亚太安全事务的历史就是在这两种状态下反复摇摆的潮汐运动。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在亚太事务上进入了新一轮的弱势周期,在国家力量大幅下降、欧亚空间与亚太空间的力量对比愈发失衡的局面下,俄罗斯逐渐滑向亚太安全体系的边缘位置。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知识精英提出了建构亚洲身份、“大欧亚伙伴关系”以及同亚太支点国家加强双边合作等应对策略,但由于综合国力与国际环境的限制,其效果尚不明显,俄罗斯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困境短时期内难以得到显著改善。

【关键词】俄罗斯 亚太安全体系 “他者”身份 定位与作用

【作者简介】封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一部时间机器,能够把沙俄时期、苏联时期的俄国战略家带到今天的莫斯科参与亚太安全问题的讨论,他们恐怕会吵得不可开交。的确,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俄罗斯的亚太安全战略常常会经历颠覆式的转变,其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定位也会因为这些改变的发生而变得大相径庭。

然而,虽然位次与形态常常发生变动,但俄罗斯与亚太国家在安全领域的互动模

---

\*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国周边跨区域安全架构的理论模型与实现路径”(2016EGJ001)的阶段性成果。

式从 19 世纪以来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俄罗斯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变迁恰恰是这种固有的历史逻辑在不同时空环境和区域力量对比结构下所呈现出的不同表现形式。如果研究者希望描述俄罗斯在当代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定位,就必须从俄罗斯与亚太地区国家的交往历史出发,把握这种互动模式与历史逻辑,并结合当前亚太地区的力量结构对比,才能够最终得出具有时代意义的结论。

多年以来,俄罗斯的亚太安全战略一直是俄罗斯研究领域的热点议题之一,各国学者对于俄罗斯的战略选择,以及俄罗斯与亚太国家的关系始终保持着密切关注,也形成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sup>①</sup>但围绕亚太主题的既有研究主要针对俄罗斯在不同时期的安全政策,以及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具体的双、多边安全合作进程而展开,缺乏对于俄罗斯在亚太安全体系中地位变迁及其原因的直接考察,对于社会文化因素

① 各国学者围绕本议题的相关研究已经形成较为丰富的成果,近年来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Клименко Анатолий Филиппович,“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систем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Китай в мировой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 19, 2014; Парамонов Владимир, Столповский Олег,“Россия и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двухсторонне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сфер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 2(62), 2009; Клименко Екатерина,“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как 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комплекс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 4, 2011; Коротич Семе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Институт? Второй Дорожки? в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не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в област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роль России,” *Известия Восточ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 4(28), 2015; Чернявский С. И.,“Вклад России в 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сфер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естник МГИМ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 2, 2010; Лукин Артем Леонидович,“Теория комплексов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Ойкумена,” *Регионовед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2, 2011; V. Petrovsky,“Russia, China and New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9, No. 2, 2013; M. Nikolaev,“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Russia’s 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6, No. 3, 2010; Pavel K. Baev,“Russia’s Pivot to China Goes Astray: The Impact on 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Architecture,”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37, No. 1, 2016; T. B. Bordachev, O. N. Barabanov,“Towards the Great Ocean, or the New Globalization of Russia,” edited by S. A. Karaganov, Moscow,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2012; I. A. Makarov, O. N. Barabanov, T. V. Bordachev, Ye. A. Kanayev, V. L. Larin, V. A. Ryzhkov,“Towards the Great Ocean-2, or Russia’s Breakthrough to Asia,” edited by S. A. Karaganov, Moscow,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2014; N. V. Bordachev, S. A. Karaganov, A. A. Bezborodov, A. T. Gabuyev, K. V. Kuzovkov, A. B. Likhacheva, A. V. Lukin, I. A. Makarov, Ye. A. Makarova, A. S. Skriba, D. V. Suslov, I. N. Timofeyev,“Towards the Great Ocean-3: Creating Central Eurasia,” edited by S. A. Karaganov, Moscow,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2015; Mikhail Galuzin,“Russia’s Engagement into the Asia Pacific Affairs,” 19 December 2016, <http://valdaiclub.com/a/highlights/russia-engagement-into-the-asia-pacific-affairs/>; Dmitry Suslov,“A Pivot towards Asia, Integration and Mega-regions, Balancing Russia’s APR Policy,” <http://valdaiclub.com/about/experts/480/>; 冯绍雷、相蓝欣主编《俄罗斯与大国及周边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蒋振军《俄罗斯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冯绍雷《面向亚太地区未来的中俄关系》,《俄罗斯研究》2013 年第 2 期,第 12~25 页; 郑羽《俄罗斯安全战略调整及其影响》,《当代亚太》2003 年第 3 期,第 19~22 页; 王海滨《21 世纪初期俄罗斯的亚太安全战略》,《国际论坛》2013 年第 2 期,第 14~20 页; 李新《试析俄罗斯亚太新战略》,《现代国际关系》2013 年第 2 期,第 17~24 页; 张健荣《俄罗斯亚太战略及其多重影响》,《西伯利亚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34~41 页; 胡仁霞、赵洪波《俄罗斯亚太战略的利益、合作方向与前景》,《东北亚论坛》2012 年第 5 期,第 80~87 页。

与安全战略选择的辩证关系论证也有所欠缺。

本文以俄罗斯与亚太空间的交往的历史逻辑为出发点,通过考察俄罗斯与亚太空间的交往历史,寻求对于俄罗斯亚太身份的诠释,以此分析其参与亚太安全事务的基本模式,并结合俄罗斯当前的国家力量与政策选择等短期可变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以期更加准确地阐述当前俄罗斯在亚太安全体系中地位与作用。

## 一、俄罗斯的身份:亚太空间中的“他者”

从历史上看,俄罗斯与亚太空间从开始接触到确立稳定联系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从基辅罗斯到莫斯科公国时代,由于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所带来的地理阻隔,俄罗斯与亚太空间的联系是缺失的。<sup>①</sup>在13~15世纪,蒙古的远征与金帐汗国的统治,使得俄罗斯和亚太地区国家在各自的历史进程中平行推进,没有形成任何有实质性意义的交集。虽然在明朝隆庆年间就曾有俄国代表前往北京,<sup>②</sup>但直到1652年(清顺治九年),俄国势力到达黑龙江流域,并且与清朝驻防军队发生武装冲突,才标志着俄罗斯正式开始接触亚太空间的安全事务。<sup>③</sup>然而,17世纪50年代的第一次接触并未促使俄罗斯成为本地区政治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到了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沙俄与清朝这两大帝帝国确定了在黑龙江流域的势力范围,俄国的扩张方向转向北冰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回避了同亚太区域国家的直接冲突。

俄罗斯真正有机会直接影响亚太空间的时刻在19世纪60年代终于到来。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作为欧洲列强的一员,俄罗斯的国家力量已经凌驾于所有亚洲国家之上。凭借游牧民族无法企及的军事优势和组织能力,俄罗斯将整个欧亚草原地区纳入其疆域,完全占领“世界岛”的枢纽。<sup>④</sup>在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和英国作为广义

① [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10页。

② [法]葛思顿·加恩著,江载华译《早期中俄关系史(1689-1730)》,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页。

③ “亚太”(Asia-Pacific)的概念源于20世纪40年代,1974年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出现,直到80年代后期才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在19世纪沙俄帝国与清帝国发生冲突的时候,亚太的概念并不存在。为了保持讨论的一致性,本文将亚太空间作为一个整体,以此讨论俄罗斯与该地理空间内各国历史性关系的形成过程,但并不代表笔者认为当时已出现亚太概念,特此说明。关于亚太概念形成历史的中文文献可参见陈鲁直《亚太地区概念形成的社会文化因素》,《亚太经济》1995年第3期,第3~4页;陈峰君《亚太概念辨析》,《当代亚太》1999年第7期,第3~9页。

④ [英]哈福德·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7~62页; [英]哈福德·麦金德著,王鼎杰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重建的政治学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9~71页。

西方文明的代表,从陆地和海洋两个方向对亚太空间内传统的亚洲国家形成了挤压。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俄罗斯拥有了直接参与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的能力,并且在此后的百余年时间里,对亚太地区安全体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曲折的历史交往进程清楚地展示了俄罗斯与亚太空间复杂而微妙的联系,这种特殊的关系奠定了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国家视野中的特殊身份:

首先,从地理视角上看,俄罗斯与亚太空间的地缘联系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沙俄帝国几百年对外扩张进程的副产品。俄罗斯所占据的亚太地理空间边缘位置,实质上是欧亚内陆帝国将草原帝国纳入现代国家体系,从而最终实现对亚太空间挤压和渗透的过程。对于俄罗斯来说,亚太地区并非其核心利益空间,而只是其力量自然延伸的结果。而在亚太地区国家看来,俄罗斯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是东亚传统秩序的破坏者,也是亚太地区安全新的外生性因素之一。这种对于地理空间的认知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与亚太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

其次,从文化身份上看,俄罗斯即便能够参与亚太事务,但从未尝试拥抱自己的亚洲身份。在俄罗斯的思想史中,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知识分子,始终将自己视为一个欧洲边缘的帝国,<sup>①</sup>从欧洲学习并且解决自身的问题已经成为俄罗斯根深蒂固的思想理念。从基辅罗斯时代开始,俄罗斯人便向拜占庭帝国借鉴最初的文化与宗教理念。到了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发生的所有改革都是根据欧洲经验进行的。所有俄罗斯社会流行的社会思潮——无论是西方主义、斯拉夫主义还是欧亚主义——都源于欧洲文明,它们之间的差异只不过是对于欧洲经验的接受和对俄罗斯传统文化的保留程度不同。<sup>②</sup>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作为欧洲文明的对应面,亚洲则是贫穷、落后与暴君政治的代称,这种认知赋予俄罗斯向东方扩张的合理性,但也基本阻塞了俄罗斯接受亚洲身份的可能。

最后,从经济联系上看,俄罗斯从来都不是亚太经济价值链体系的组成部分。在19世纪,作为影响亚太区域安全状态最大的两大帝国,英国与俄罗斯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参与亚太事务的路径。英帝国在亚太地区开辟殖民地的同时,也将新的经济生产方式、新的贸易体系和管理体系带到这一地区,逐渐掌控该区域的经济网络。但沙俄帝国并没有英国那种强大的商品生产与国际贸易能力,无法为亚太地区提供

<sup>①</sup> Dominic Lieve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II, Imperial Russia (1689-191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1.

<sup>②</sup> Sergey Karaganov, "A Turn to Asia: the History of the Political Idea,"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http://eng.globalaffairs.ru/pubcol/A-turn-to-Asia-the-history-of-the-political-idea-17926>.

经济方面的新内容,它主要选择以控制更多领土为参与亚太事务的主要方式。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俄罗斯始终没有成为亚太区域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甚至在很长的时间段内,与亚太经济系统几乎完全隔离。这也进一步强化了亚太国家对于俄罗斯外来者的认知。

从根本上说,俄罗斯是亚太空间中的“他者”(the other),无论从历史文化还是从经济联系来看,俄罗斯都无法完成亚洲身份的内化,始终难以成为亚太空间的天然成员,这一点构成了俄罗斯与亚太安全体系关系评估的逻辑起点。吞并广阔的亚洲草原地区,赋予了俄罗斯在欧亚内陆空间最大的发言权,也使得其拥有了通往亚太空间的通道。但俄罗斯顽固的“他者”身份,使其难以成为亚太安全领域的运转枢纽,而只能从外部对于亚太空间内的安全事务施加影响。这种状态也就意味着,俄罗斯对于亚太安全议题的参与度会随着俄罗斯国家实力,以及亚太安全结构的改变而发生周期性变化。当俄罗斯国力强盛,军事投送能力较强时,它能够将自己的影响范围覆盖到更多的亚太区域,反之,其影响力就会受到严重的局限。于是,结合特定分析要素,我们就能够对俄罗斯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亚太安全事务的影响进行评估,也能够对其在现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地位给予更加准确的评价。

## 二、潮汐运动: 俄罗斯参与亚太安全事务的历史逻辑

俄国史学家多米尼克·列文曾说过,从17世纪到20世纪末,俄罗斯的历史始终是在“学习欧洲—帝国崩溃—重新崛起—陷入停滞—再次学习”<sup>①</sup>的周期中不断循环的过程。在崛起与崩溃的交替中,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国势的变迁对俄罗斯在亚太安全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产生直接的影响,其在亚太空间的影响力也出现周期性的进退反复,构成非常明显的潮汐运动。

### (一) 沙俄时期: 扩张的极限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是俄罗斯在亚太安全领域推动第一波扩张的主要时段。本轮扩张主要表现为俄罗斯在远东和中亚两个方向对于清政府的战略压迫,从而实现对于亚太地区领土的吞并,以及对于地区冲突的直接干涉。

---

<sup>①</sup> Dominic Lieven, *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99 ~ 300. 关于列文教授对于俄罗斯的看法可参考封帅《多米尼克·列文与俄罗斯研究中的帝国视角》,《俄罗斯学刊》2015年第5期,第41~51页。

1856~1861年间,俄罗斯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机会彻底推翻了《尼布楚条约》所确立的远东格局,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署直接控制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区域。“当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一场代价巨大的斗争时……俄国人已经占领了黑龙江以北的地区和该地区以南的大部分满洲海岸……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加在一起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而且在缔结和约时俨然以调停者自居”。<sup>①</sup>

在中亚方向,俄罗斯利用1864年的《勘分西北界约记》(即《塔城条约》),获取了西北方向大片土地的控制权。19世纪70年代,俄罗斯又通过扶植阿古柏政权,试图进一步向新疆腹地渗透。直到左宗棠平定阿古柏,收复新疆之后,俄罗斯才被迫退出伊犁地区。

1890年后,沙俄帝国向亚太地区的扩张进程进一步加速,中国东北地区成为其扩张的主要目标。一方面俄罗斯通过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试图利用技术手段缓解其不利的地缘环境。另一方面采取各种方式向东北地区渗透,以求建立在东北地区不可挑战的战略优势。

为了避免日本实力在东北地区的扩大,俄罗斯主导了“三国干涉还辽”,阻止日本对辽东半岛的控制。利用《中俄密约》的签署,获得在东北地区修建过境铁路(即中东路)的权利。利用德国占领胶州湾的机会,强行租借旅顺口和大连湾,使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获得了梦寐以求的不冻港。1900年,俄罗斯以义和团运动对于中东路和俄国财产的破坏为借口,出兵占领东北全境。至此,俄罗斯在亚太空间的势力范围达到顶点,但这种激进的扩张打破了列强在本地地区的力量平衡,最终诱发正面冲突。

1904年2月8日,日本舰队袭击旅顺口,日俄战争爆发。俄罗斯在远东方向力量严重不足的缺陷在这场战争中显露无遗,俄国陆军和海军先后被击败,被迫同日本议和,将长春铁路及辽东半岛的特权让与日本,并割让库页岛南部及其以南岛屿。俄军退回哈尔滨,东北地区新的权力格局就此确立。此次战争还诱发了俄国的国内革命运动,迫使俄国启动国内的政治改革,短时间内无力对东北地区发起新的挑战。

以日俄战争为标志,俄罗斯向亚太空间的第一轮扩张宣告终结。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俄罗斯在这一阶段对于亚太空间安全事务的干涉主要针对清帝国而展开,采取的也是19世纪最为普遍的吞并领土和构建势力范围等方式。凭借其对于清帝国压倒性的战略优势,俄罗斯在这一时期攫取了大片领土,并且成功地使俄国势力渗入

<sup>①</sup> [德]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4页。

亚太腹地,成为此时亚太陆上安全事务最有力的参与者。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俄帝国进入革命时代的前夜,虚弱的国力无法为逐渐加速的远东扩张进程提供充分的支持。最终,当亚太空间内的新兴国家对俄发起强有力的挑战时,已是外强中干的沙俄帝国只能选择妥协和退却。日俄战争的失败实际上为俄罗斯划定了在亚太地区传统领土扩张模式的空间极限,如果俄罗斯希望进一步提升在亚太安全事务的影响力,则必须在国家力量和参与方式两个方面出现较大的积极变化。

## (二) 苏联前期: 退潮与维持

由于在日俄战争中败北,俄罗斯帝国向东北地区的推进受到遏制,被迫接受日本占据优势的远东安全格局。1905~1945年间,俄罗斯在亚太安全方面总体上呈现出战略收缩的态势,试图维持和消化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持续扩张的成果。同时,在临近欧亚空间的边缘地带继续寻找薄弱环节,保持局部方向上有限的进取态势。

《朴茨茅斯协议》签订之后,俄罗斯势力退出了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在很长时间内无力挑战日本的地位。但其凯觎亚太地区领土的传统思路并没有改变,而是将扩张的方向转向更加临近中亚的内陆地区。凭借对清帝国的实力优势,通过策动民族分裂主义运动等方式,俄罗斯势力继续向蒙古和新疆等地渗透。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帝国土崩瓦解,沙俄利用这一机会策动外蒙古独立,强占唐努乌梁海地区,并在呼伦贝尔、伊犁、阿尔泰等地先后制造各种军事冲突,以此尝试新的领土吞并行动。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沙皇被苏维埃政权所取代。尽管在立国之初,苏俄为巩固新生政权,曾试图通过积极的外交行动和让步对亚太各国示好,<sup>①</sup>但在其政权稳固之后,仍继承了沙俄帝国晚期所秉持的亚太安全政策,即全力维护自身在亚太地区的既得利益,但不尝试挑战日本的地区战略优势,转而向中国方面寻求利益补偿。在这种战略逻辑的引导下,苏联继续推动外蒙古的独立运动,持续加强对新疆地区的渗透,而对于中国收回中东路权益的行动则给予强烈的军事回应。<sup>②</sup>这种战略思路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顶峰,面对“9·18”事变后日本独占东北地区的客观事实,苏联选择接受日本对于东北的控制,不仅完全退出东北地区,并且将中东铁路以出售的形

<sup>①</sup> 这一时期,苏俄政府先后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第二次对华宣言》、《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并同中国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以争取中苏关系缓和,改善不利的国际环境。关于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发展状况可参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3~22页。

<sup>②</sup> 即“中东路事件”。关于该事件的讨论可参见何汉文《中俄外交史》,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389~425页。

式转让给日本。在“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武装冲突中占据优势之后,苏联仍坚持避免与日本形成直接对抗,而选择通过签订《苏日中立条约》的方式稳定远东形势,从而将本国的主要军事力量集中于欧洲方向,这种选择也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体走向。

从日俄战争到二战末期,俄罗斯/苏联在亚太安全领域进入了第一次退潮期,在这一时期,它在亚太空间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是相对有限的,其影响被限制在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区。它在这一时期并未做出改变亚太安全既有结构的尝试,也在实践中尽量回避与亚太空间内其他大国的冲突。收缩与维持是这一时期俄罗斯/苏联亚太政策的核心要义,为了弥补远东方向的利益损耗,苏俄选择继续对中国施压,并开始插手中国国内政治事务。<sup>①</sup>虽然这种选择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从结果上来看,却意外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远东方向的妥协使其避免两线作战,能够集中力量击败纳粹德国的全面入侵。到1945年8月苏联军事力量再次全面进入亚太空间时,国际体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联终于在亚太安全事务中迎来了自己的巅峰时刻。

### (三) 冷战时期: 亚太安全的核心要素

冷战期间苏联在亚太安全事务上的发言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方面,苏联(俄罗斯)的影响力历史上首次覆盖到东南亚地区,几乎拥有对于整个亚太空间安全事务的发言权。另一方面,苏联成为亚太地区安全结构的核心支柱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冷战期间亚太地区的安全冲突与对峙的形态。

亚太地区是冷战的前线,遏制与反遏制构成了这一时期亚太安全的主题词。凭借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苏联重新划定了亚太地区的国家版图,收回了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得的领土与特权,并且占领其北方岛屿。同时,借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和亚洲民族主义革命的蔓延,亚太空间内众多国家加入了苏联体系,使其在亚太安全问题上获得了充分的运筹空间。利用自身在陆上空间的军事优势和盟友网络,苏联不断对美国在亚洲的遏制体系进行挑战。

冷战期间,苏联在越南、蒙古都设有军事基地,其中越南金兰湾基地是苏联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与中国、朝鲜及其他亚太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这使得苏联拥有几乎覆盖全部亚太空间的军事投放能力。这一时期在亚太地区出现的大规模军事冲突——无论是在朝鲜半岛还是在印度支那地区——都是

<sup>①</sup> 关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可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美苏对抗格局在亚洲的具体呈现。苏联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冷战时期亚太地区所有安全协议的谈判和协商<sup>①</sup>,苏联对于敏感安全问题的表态直接决定了相关安全议题的走向。<sup>②</sup>总而言之,在冷战期间,任何亚太安全问题的解决都无法绕开苏联,苏联能够对亚太地区的安全议程产生直接的影响。冷战时期的亚洲安全结构同样呈现出非常清晰的两极对抗结构,美国与苏联成为亚太安全体系中两个最为关键的行为体。

由于世界的政治文化变迁,19世纪那种直接吞并领土的扩张方式已经不再为世界各国所接受。但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有利条件,苏联仍然突破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将其在安全领域的影响力扩展到了整个亚太空间。冷战的40余年是俄罗斯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地位最为突出,作用得以最大化释放的历史时段。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也成为支撑全球范围内两极对抗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苏联在亚太安全中的关键作用是全球两极体系的映射,当全球层面的两极格局瓦解时,苏联在亚太空间的安全地位自然无法维持,其影响力受到严重削弱也就难以避免。

#### (四) 延续的历史逻辑

纵观数百年来俄罗斯参与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俄罗斯与亚太空间的关系始终在两种“平行”的状态下摇摆。一种情况是它凭借超越亚太国家的力量,强行“挤进”亚太空间,直接干预亚太安全事务。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其力量削弱,被亚太区域大国“挤出”亚太空间,从而丧失在亚太事务中的大部分发言权。俄罗斯参与亚太安全事务的历史逻辑就是以潮汐的形态,突然从一种极端状态跳跃至另一种极端状态,很少出现介于二者之间的过渡状态,往往会在短时间内形成在安全体系内的地位与影响力的剧烈变动。

这种历史逻辑根源于俄罗斯在亚太空间中的“他者”地位,俄罗斯尽管对于参与亚太安全事务始终抱有期待,但作为亚太空间中的“他者”,它只能以非亚洲国家的身份参与亚太安全事务,成为亚太安全体系的外部要素。在不同情况下,它或者以外部平衡者的身份干预亚太安全体系,或者以外部冲击者的方式影响体系构建,但始终

---

<sup>①</sup> 冷战时期苏联直接参与签订的与亚太安全议题相关的协议包括《越南停止第位行动的协定》、《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柬埔寨冲突全面整治解决协定》、《关于柬埔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及其不可侵犯、中立和国家统一的协定》、《柬埔寨恢复与重建宣言》、《巴黎国际会议最后文件》等等。

<sup>②</sup> 冷战时期,苏联在朝鲜问题、越南问题、台湾问题等亚太地区重大安全议题上的态度与立场对于相关安全议题的走势产生了关键的影响。相关情况可参见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无法成为体系的建构枢纽。这种参与方式意味着俄罗斯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作用始终受到两组体系性因素的直接影响:一是要看俄罗斯在全球安全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因为作为全球重要的安全枢纽地带,亚太安全环境与全球安全结构的互构状态非常明显,在全球层面的角色与地位会对俄罗斯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威望产生直接影响。二是要看俄罗斯与亚太国家的力量对比情况。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在亚太安全事务中的战略活动空间,以及在具体安全问题上的作用发挥限度。

坚固的身份认同与复杂的体系性要素使得从帝国时期就已形成的历史逻辑延续至今,且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在亚太空间的行为方式。今日我们所面对的是进入第二次退潮周期的俄罗斯,历史累积的思考方式以及全球与地区层面上的背景环境变迁都能够在其当代战略设计中留下深刻的烙印。这也为我们研判其当代亚太安全政策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

### 三、滑向边缘:退潮周期俄罗斯的角色变化

1991年,随着苏联的解体,新生的俄罗斯联邦在短时间内失去了苏联在亚太安全事务中曾经拥有的巨大话语权,进入其历史上第二次在亚太安全事务上的退潮周期。但与一个世纪以前的收缩情形有所不同,后冷战时代的全球与亚太安全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迁,而作为亚太空间“他者”的俄罗斯在结构变化的大背景下,逐渐由亚太安全体系的核心滑向系统的边缘。

第一,俄罗斯的军事投送能力已经不足以支撑其直接干涉亚太安全事务。

苏联解体之后,由于综合国力的限制,俄罗斯已经不能够维持苏联时期的庞大军备。在经济实力有限的情况下,宝贵的军费投入需要集中于欧洲、高加索等重点战略方向,使得俄罗斯在亚太方向的军事规模持续萎缩,特别是军事远程投送能力受到严重的影响。

冷战时期,为了应对来自东方的战略威胁,苏联在远东地区最多时曾囤积了约118万兵力,对于所有亚太国家都形成了压倒性的军事优势。<sup>①</sup>冷战结束后,由于亚太不再是重点军事战略方向,经历多次裁军整编之后,俄罗斯东部军区目前保留了1

---

<sup>①</sup> 冷战时期,远东方向是苏联重兵布防的区域,苏联在远东地区最多时曾囤积了约118万兵力,其中包括54个陆军师,14000辆坦克,600多艘海军舰艇,2000架作战飞机,以及各类中远程导弹650多枚。如此庞大军事力量的存在使得苏联有能力对亚洲安全事务产生影响,同时也对周边国家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个机炮师和26个旅级作战单位,总兵力约为12~15万人。<sup>①</sup>作为承担亚太地区主要军事投送任务的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苏联解体之后20多年的时间里持续萎缩,<sup>②</sup>截止到2016年底,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大中型的水面作战舰艇仅剩余“光荣”级巡洋舰1艘、<sup>③</sup>“现代”级导弹驱逐舰1艘、<sup>④</sup>“无畏”级反潜驱逐舰4艘<sup>⑤</sup>以及少量登陆舰、扫雷艇和导弹艇,所有水面舰艇的舰龄都已超过30年。俄罗斯海军将有限的经费集中投入潜艇部队的更新,2010年后入役的北风之神级核潜艇<sup>⑥</sup>已有两艘部署于太平洋舰队,以此确保在水面舰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维持战略威慑力量。

整体来看,俄罗斯在远东方向的军事部署完全立足于领土、濒海防御以及战略核反击,海外投送能力大幅下降使得俄罗斯在亚太可动用的常规军事力量已经弱于几乎所有的亚太大国,处理亚太空间的安全事务能力严重不足。

第二,俄罗斯面对的是亚太地区力量完全压倒欧亚地区的历史性变局。

除了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之外,俄罗斯所要面对的更大挑战是亚太地区国家经济与政治的整体性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区域,截止到2016年,亚太地区经济总量超过2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4以上,并且肩负着全球进出口贸易枢纽的重任,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在同一历史时段,俄罗斯所主导的欧亚区域则在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等方面被远远甩在后面。到2016年,作为欧亚区域最重要的多边合作机制,欧亚经济联盟(EAEU)的经济总量刚刚超过2.2万亿美元,在工业生产能力和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都与亚太地区出现了巨大的差距。<sup>⑦</sup>凭借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亚太地区各国在国家能力建设上对欧亚区域国家形成了全面超越,整个欧亚大陆的区域力量对比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这种力量格局的变化使得俄罗斯的地缘战略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历史上第一次面临在东西两个方向同时出现强大战略压力的局

① 在2010年的军事体制改革之后,俄罗斯建立新的东部军区,统一整合与指挥远东方向的俄罗斯武装力量。东部军区合并了原俄罗斯远东军区、外贝加尔军区和太平洋舰队的海岸部队。

② 在冷战时期,苏联太平洋舰队曾一度拥有各类舰艇600余艘,总吨位180万吨,其中主战舰艇超过160艘,并拥有两艘“基辅”级航空母舰,成为太平洋地区唯一能与美国海军抗衡的海上力量。

③ 即1164型巡洋舰“瓦良格”号,1989年入列。另外,1144型导弹巡洋舰“拉扎列夫海军上将”号目前正在养护中,预计将除役或离开太平洋舰队。

④ 即956型驱逐舰。

⑤ 即1155型大型反潜舰。

⑥ 即955型战略核潜艇,其中“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与“弗拉基米尔·诺莫马赫”号已先后于2013和2014年加入太平洋舰队。

⑦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Too Slow for Too Long,” April 2016, <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16/12/31/Too-Slow-for-Too-Long>.

面。

第三,俄罗斯与亚太地区的关系模式正在由相互依赖走向单向依赖。

随着亚太地区国家的整体崛起,俄罗斯与亚太地区国家的互动模式也在发生着微妙的改变。在很长时间里,俄罗斯曾是亚太地区国家在军事技术、经济制度甚至意识形态的重要来源地,通过对俄罗斯的模仿,很多亚洲国家完成了初始的国家建构。在这一状态下,俄罗斯与亚太地区之间的互动可以被看作是相互依赖的过程,也使得俄罗斯获得参与亚太事务的天然路径。

然而,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俄罗斯却陷入转型的泥潭,其作为模式介绍者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消失。时至今日,由于俄罗斯并不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占据关键位置,且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亚太地区对于俄罗斯的依赖程度已经降到很低的水平。相反,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困境却使得俄罗斯对于亚太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上升。这种状态在政治结构上的反馈便是俄罗斯与亚太地区的关系从相互依赖逐渐向单向依赖过渡,对于俄罗斯在亚太事务中的战略地位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从根本上说,后冷战时代俄罗斯与亚太空间的关系仍然延续着原有的历史逻辑,俄罗斯在亚太空间的“他者”身份并没有改变,但结构层面的诸多深刻变革对于俄罗斯参与亚太安全事务又产生了更加不利的影响。亚太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得俄罗斯已经不可能像历史上无数次重复的那样,将亚太地区作为在欧洲方向博弈失败后求取的补偿的“战略后方”,但如何确定亚太地区在俄罗斯对外战略中的位置,对于俄罗斯政府来说也是一个难题。事实上,俄罗斯在这一问题上还是犹豫不决和举棋不定的,这也就造成了在冷战结束之后相当长时间里,俄罗斯在亚太战略上的反复摇摆。

对于亚太地区战略地位的争议贯穿于整个冷战后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在其外交的起步阶段,俄罗斯将发展对美、欧、日关系作为最重要的外交目标,在1992年制定的《对外政策基本概念方案》与1993年版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中,对于亚太地区的重视程度很低,而且还特别强调,俄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策略是与美国开展密切合作,共同承担亚太地区的安全责任。<sup>①</sup>但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美俄关系逐渐陷入僵局,俄罗斯外交路线开始回摆,对于亚太地区的重视程度有所提升。到了反映普京外交思想的2000年版和2008年版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中,俄罗斯大幅调整了对外政策的地区优先方向排序,亚太地区成为独联体、欧洲、美国之后

<sup>①</sup> 霍军摘译《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和平与发展》1993年第1期,第58~61页。

排名第四的重要外交方向,并且将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与中国、印度、日本的双边合作作为贯彻其亚太战略的主要路径。<sup>①</sup>到了2013年版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发表时,亚太地区的排序没有变化,但对于参与亚太安全问题的表述进一步提炼为“希望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以集体的方式在亚太地区建立透明和平等的安全与合作体系”。<sup>②</sup>然而,在2016年底最新版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中,亚太地区在俄罗斯外交战略中的排序再次下降,列在独联体、欧洲与大西洋地区、美国和北极地区之后,排序降到第五位。<sup>③</sup>

这种战略摇摆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俄罗斯在冷战结束后的退潮周期中,对自身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位置的期待与现实状态存在着明显的落差,<sup>④</sup>因此,在政策制定方面难免会出现争论和反复。从俄罗斯自身的意愿来说,无论是出于降低亚太地区的安全风险对于本国安全的威胁,还是获得更多的战略资源参与提升在全球事务中的发言权的目的,它都愿意更多地参与亚太地区安全事务,尽可能维持冷战时期在亚太安全领域积累的威望。正是作为这种历史威望的余荫,俄罗斯能够被亚太地区各种多边安全机制所接纳,它先后成为东盟地区论坛(ARF)、东亚峰会(EAS)、六方会谈、东盟防长扩大会议(ADMM+8)、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的正式成员,能够参与亚太安全事务与安全理念的讨论。但另一方面,由于地区力量对比的历史性变迁以及综合国力的局限,俄罗斯已经无力为亚太空间提供安全公共产品。这就意味着俄罗斯不能有效推进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也不能对地区安全议程产生很大影响,俄罗斯所提出的亚太安全架构设计也很少得到亚太国家的响应。<sup>⑤</sup>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领导人虽然希望在亚太安全领域有所作为,又担心付出巨大的战略成本而得不偿失,诸多顾虑的存在,使得俄罗斯的亚太战略在进退之间反复权衡,也迫使政

---

① 参见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scrf.gov.ru/document/decree/2000/07/10.html>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2000年6月28日批准;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kremlin.ru/text/docs/2008/07/204108.Shtml>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俄罗斯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2008年7月12日批准。

②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garant.ru/products/ipo/prime/doc/70218094/>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2013年2月12日批准。

③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1451/>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2016年11月30日批准。

④ 关于普京参与亚太地区事务的期望可参考普京《俄罗斯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走向亚太地区的持续稳定发展》,《普京文集(2002-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21~524页;普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闭幕后的公开发言及答记者问》,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版,第480~492页。

⑤ 近年来,俄罗斯曾先后提出过“新亚洲”、“大欧亚”、“跨太平洋安全与发展新架构”等多项涉及亚太空间的安全架构建设的设想,但均未得到亚太国家的积极响应。

策层面不断摇摆。可以说,在退潮周期内,作为亚太空间的“他者”,俄罗斯虽然存在于亚洲安全体系之内,却无力成为体系内的一极,但又不愿改变自己的大国身份采取追随立场,于是只能一步步滑向体系的边缘,成为徘徊于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体系内那个“多余的人”。<sup>①</sup>

#### 四、突围路径:通向太平洋的道路经过北京

事实上,俄罗斯领导层和知识精英对于亚太地区的未来发展前景,及其对俄罗斯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有着清醒的认知,<sup>②</sup>并且对于俄罗斯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他者”身份,以及当前这种进退维谷的复杂处境也有比较充分的了解。针对俄罗斯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困局,俄罗斯国内已经在理论设计和实践探索方面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希望能够在其中找到最为合理的战略突围路径,使得俄罗斯即便在退潮周期内也仍然能够在亚太安全体系内维持更为合理的战略定位。

如前文所述,俄罗斯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困境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制约,其一是俄罗斯在亚太空间的“他者”身份,其二是俄罗斯与亚太国家力量对比的不利变化,而俄方的思考与调整也正是基于这两个方面展开:

一方面,在理念层面探索俄罗斯拥抱亚洲身份的可能性。

俄罗斯学者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参与亚太事务至今,“俄罗斯从未被亚洲国家视为‘自己人’”,<sup>③</sup>俄罗斯也并未将自己看作是一个亚洲国家。这是俄罗斯与亚太国家互动模式的核心矛盾,也是俄罗斯在亚太安全体系中地位形成的根源所在。那么,如果俄罗斯能够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真正塑造并接受自己的亚洲国家身份,将国家发展的重点转向亚洲,那么一切参与亚太安全体系的障碍都将变成技术性问题,完全可

---

<sup>①</sup>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代表作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主人公,也是俄罗斯文化史上最经典的人物形象之一。在这首长诗中,普希金成功地塑造了“多余的人”的典型形象,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社会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将俄罗斯与亚太国家关系拟人化,那么俄罗斯自己也正是亚太安全体系中这样一个“多余的人”,所以本文借用了“奥涅金”这一形象,以期更加形象地说明作者观点。相关内容可参见[俄]普希金著,智量译《叶甫盖尼·奥涅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sup>②</sup> 俄罗斯领导人曾在多个重要场合阐述过亚太地区对俄罗斯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表达了俄罗斯参与亚太事务的强烈意愿。相关内容参见 Владивосток-2012: российская пресса для форума АТЭС, <http://www.kremlin.ru/transcripts/16390>; Путин В. В., “Россия и меняющийся мир”,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27 февраля 2012 года.

<sup>③</sup>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Внутренняя империя, “о России в процессе пересмотра мир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http://www.kommersant.ru/doc/2634034>.

以逐步得到解决。

俄罗斯国防与外交关系委员会前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Sergey Karaganov)是这一激进观点的积极倡导者。早在2010~2011年,卡拉加诺夫就在各种国际场合强调亚太地区对于俄罗斯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他的主导下,瓦尔代俱乐部(Valdai Club)先后发表了三份名为Towards the Great Ocean的战略报告,全面阐述俄罗斯转向亚太的意义、目标与路径。<sup>①</sup>在卡拉加诺夫看来,历史上的俄罗斯是通过学习和内化欧洲文明而成为今天的形态,但当世界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前沿逐渐由欧洲转向亚洲时,俄罗斯不应在思想上一味固守欧洲身份,排斥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俄罗斯知识界应该自上而下地思考俄罗斯的亚洲身份,从精神和理念上树立起俄罗斯的未来在亚洲的态度。拥抱亚洲身份并不是对抗和背离欧洲,而是探索具有时代意义的现代化发展路径。他坚持认为,如果彼得大帝在世,他一定会在太平洋沿岸建立新首都,将俄罗斯拉向东方。<sup>②</sup>

作为这种思路在国家建设层面的反映,俄罗斯在政策层面对于加强远东开发提出了多项举措。2007年和2009年,俄罗斯联邦政府先后公布了《远东及外贝加尔地区2013年以前经济社会发展纲要》和《2025年前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作为远东开发的指导性文件。2012年专门设立远东发展部,并且制定《西伯利亚和远东发展法草案》、《俄罗斯远东地区土地免费配发法案》等一系列配套措施,试图吸引亚太国家资金注入,让远东搭上亚太经济发展的顺风车。然而,由于远东地区的自然条件恶劣,联邦层面对于远东地区的投资严重不足,加之基础设施条件差,国内商业环境不佳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这种尝试迄今为止并未取得预想的成果,该计划在

---

① T. B. Bordachev, O. N. Barabanov, "Towards the Great Ocean, or the New Globalization of Russia," edited by S. A. Karaganov, Moscow,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2012; I. A. Makarov, O. N. Barabanov, T. V. Bordachev, Ye. A. Kanayev, V. L. Larin, V. A. Ryzhkov, "Towards the Great Ocean-2, or Russia's Breakthrough to Asia," edited by S. A. Karaganov, Moscow,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2014; N. V. Bordachev, S. A. Karaganov, A. A. Bezborodov, A. T. Gabuyev, K. V. Kuzovkov, A. B. Likhacheva, A. V. Lukin, I. A. Makarov, Ye. A. Makarova, A. S. Skriba, D. V. Suslov, I. N. Timofeyev, "Towards the Great Ocean-3: Creating Central Eurasia," edited by S. A. Karaganov, Moscow,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2015.

② 笔者从2011年起就在上海、莫斯科等不同场合的会议和演讲中听到卡拉加诺夫先生阐述这一观点,具体观点可见 Sergey Karaganov, "A turn to Asia: the history of the political idea,"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13 January 2016, <http://eng.globalaffairs.ru/pubcol/A-turn-to-Asia-the-history-of-the-political-idea-17926>. 其相关观点还可参见: Sergey Karaganov, "Russia's Asian Strategy,"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 July 2011, <http://eng.globalaffairs.ru/pubcol/Russias-Asian-Strategy-15254>; Sergey Karaganov, "Russia Needs One More Capital - in Siberia,"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1 June 2012, <http://eng.globalaffairs.ru/pubcol/Russia-Needs-One-More-Capital-in-Siberia-15567>; Sergey Karaganov, "Russia Turning East?"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18 February 2014, <http://eng.globalaffairs.ru/pubcol/Turning-East-16383>.

俄国内也存在很多争论和非议,尚未成为俄罗斯各界的共识。当然,身份认同层面的变革本身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与推动,这种观念是否能够最终成为俄罗斯国内的主流态度仍需进一步观察。

另一方面,在执行层面调动外交资源,寻找战略支点,借力参与亚太事务。

为了弥补俄罗斯在参与亚太安全事务中综合国力不足的问题,俄罗斯正在积极尝试从多边与双边两个方面寻找战略支点,试图以间接的形式参与到亚太安全事务的处理进程中来。

2016年,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正式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Great Eurasian Partnership)的理念,并努力在各种国际对话平台上推广这一观念。<sup>①</sup>在俄罗斯学者看来,“大欧亚”理念有助于俄罗斯更加深入地融入亚太安全体系。“大欧亚伙伴关系”意图打造一个囊括整个亚太与欧亚区域的合作对话平台,欧亚经济联盟(EAEU)、上合组织(SCO)、东盟(ASEAN),甚至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一带一路”倡议等都可以纳入这一广义的合作平台中,实现亚太与欧亚空间打通的大型区域一体化进程。<sup>②</sup>作为这一理念的重要一环,俄罗斯也转变了最初对于中国在欧亚空间推动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抵触态度,转而积极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尝试在贸易、投资、物流、金融等多个领域推动欧亚空间与亚太空间的整合。<sup>③</sup>如果这一设想能够实现,俄罗斯就能够将其在欧亚空间的政治与地缘优势完全释放,成为欧亚空间与亚太空间的纽带,以及亚太安全事务和欧亚安全事务唯一的协调者,从而自然完成深度参与亚太安全事务的目标,并且在该区域的一体化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促进国家经济,特别是远东地区经济的发展,提升俄罗斯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

除了宏观理念的建构之外,俄罗斯也利用双边关系建设在亚太空间寻找战略支点。在俄罗斯专家看来,中国、东盟、越南、日本构成了当前俄罗斯参与亚太安全事务

---

① Путин В. В.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пленар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XX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2178>.

② Sergey Karaganov, “From East to West, or Greater Eurasia,”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http://eng.globalaffairs.ru/pubcol/From-East-to-West-or-Greater-Eurasia-18440>; Timofei Bordachev, “Russia in Asia and Eurasia: Successes and New Challenges,” [http://valdaiclub.com/a/highlights/russia-in-asia-and-eurasia/?sphrase\\_id=25319](http://valdaiclub.com/a/highlights/russia-in-asia-and-eurasia/?sphrase_id=25319).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 [http://www.gov.cn/xinwen/2015-05/09/content\\_2859384.htm](http://www.gov.cn/xinwen/2015-05/09/content_2859384.htm)。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可参见秦放鸣、冀晓刚《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研究》,《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4期,第34~40页。

过程中最重要的几组双边关系。

俄罗斯通向太平洋的道路要经过北京。在俄方看来,中俄之间稳定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目前俄罗斯参与亚太安全事务最有效的战略支点。<sup>①</sup>美国的战略挤压是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不断升级的重要背景因素,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由冷战时期延续而来的盟友体系对于中国和俄罗斯都构成了战略威胁,中俄在这一问题上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此外,冷战结束后,中俄两国在欧亚空间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广泛合作使两国的战略互信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也为双方安全合作的建立奠定了良好基础。至少在东北亚安全议题上,俄罗斯的支持对于中国的安全利益至关重要。

俄罗斯同样重视发展同东盟及其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俄罗斯将东盟视为推进亚太空间安全机制建设的重要力量,同时也积极参与东盟主导的各种地区安全对话机制。作为东盟传统的对话伙伴国,俄罗斯近年来着力拓展同东盟各个层次的交往。2016年5月,第三次俄罗斯与东盟峰会在索契举行,双方的讨论涉及安全合作与联合防控等诸多议题。加强与东盟的合作,为俄更加深入参与亚太安全多边机制提供条件,也为俄参与反恐等非传统安全议题拓展新空间。除了加强同东盟合作之外,俄罗斯也试图通过扩大军售、加强能源开发合作等方式加强同东南亚地区的传统友好国家越南的双边关系,积极寻求在东南亚安全议题上可能形成的影响。<sup>②</sup>

此外,俄罗斯还积极发展同日本、韩国等亚太地区重要国家的双边合作关系,通过首脑峰会等方式加强在安全领域的对话,保持在重点安全议题上的沟通与合作。2016年,俄罗斯采取多项措施努力修复因乌克兰危机而陷入低谷的日俄关系,两国领导人在多边场合多次会面,最终促成了普京2016年12月对日本的正式访问。中断了4年之久的日俄外长与防长的2+2磋商,以及副外长级的日俄战略对话也相继恢复。虽然在北方领土等关键问题上尚未取得突破,但日俄关系已经走出低谷,逐渐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同样,在2016年,普京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与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举行了首脑会晤,两国在投资与经贸合作等领域形成了诸多共识。

从战略目的上分析,俄罗斯试图通过加强同众多亚太国家的双边关系在亚太地

---

<sup>①</sup> Dmitry Suslov, "A Pivot towards Asia, Integration and Mega-regions, Balancing Russia's APR Policy," <http://valdaiclub.com/about/experts/480/>.

<sup>②</sup> Mikhail Galuzin, "Russia's Engagement into the Asia Pacific Affairs," <http://valdaiclub.com/a/highlights/russia-engagement-into-the-asia-pacific-affairs/>.

区保持一种特殊的状态,即亚太国家同俄罗斯的关系始终好于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sup>①</sup>争取在特定安全议题激化时,能够获得亚太国家关系调停人的角色。同时,俄国学者承认尽管俄罗斯目前参与亚太安全事务最直接、最有效的依托是中俄关系,但它们并不希望自己的亚太战略完全依附于中国,更倾向于采取平衡的亚太政策,<sup>②</sup>在加强中俄关系的同时也提升同美国的亚太盟国的交往,并且开拓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合作关系,从而保持自己在亚太安全议题上拥有足够的战略运筹空间。<sup>③</sup>

总的来说,无论是“大欧亚伙伴关系”的理念,还是同亚太国家拓展双边安全合作,都反映出俄罗斯政府和知识精英对于当前自身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边缘位置的忧虑。俄罗斯虽然不是美国推动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目标,但其在亚太地区不断增加的军事部署和外交行动不可避免地对俄罗斯东线的战略安全形成了压力,在乌克兰危机和西方制裁的大背景下,如果不能改变自身在亚太安全体系中话语权缺失的问题,难免会陷入两线作战,进退维谷的战略困境之中。这也是俄罗斯各界积极探索改善俄罗斯在亚太地区战略地位的根本动因。

从理论上讲,俄罗斯战略家所提出应对措施的设计是比较合理的,但精巧的设计能否最终落实还不得而知。事实上,在亚太地区分散的权力结构和复杂的利益关系中,任何宏大的战略设计要最终实现,都需要投入充足的经济与政治资源。而身处西方制裁环境下的俄罗斯经济仍深陷衰退的泥潭之中,<sup>④</sup>同西方关系的严重恶化也使得亚太国家对于迎合其所提出的安全理念存有很多的顾忌。俄罗斯在短时期内无法获得推进其战略设计的有效手段,很多设计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加以讨论,在实践层面仍需依托中俄关系或多边安全合作平台有限参与亚太安全事务。要想扭转自身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困境,俄罗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① Timofey Bordachev, “Russia in Asia and Eurasia: Successes and New Challenges,” [http://valdaiclub.com/a/highlights/russia-in-asia-and-eurasia/?sphrase\\_id=25319](http://valdaiclub.com/a/highlights/russia-in-asia-and-eurasia/?sphrase_id=25319).

② 关于这种观点的解释可参见:Pavel K. Baev, “Russia’s Pivot to China Goes Astray: The Impact on 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Architecture,”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37, No. 1, 2016, pp. 89~110.

③ Dimitry Suslov, “A Pivot towards Asia, Integration and Mega-regions, Balancing Russia’s APR Policy,” <http://valdaiclub.com/about/experts/480/>.

④ 受到西方制裁与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下跌的影响,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在2015年下降了3.7%,2016年降幅有所收窄,但预计仍将下滑0.5~0.6%,国内的经济问题远未解决,<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e/201610/20161001490595.shtml>。

## 五、结论:徘徊于当代亚太安全体系边缘的“奥涅金”

160多年前,沙俄帝国携并吞草原帝国的威势进抵亚太空间,强势开启了参与亚太安全事务的历史进程。至此以后,随着国运起伏,俄罗斯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历经了多次变迁,但从历史逻辑中凝聚而成的参与模式却始终没有改变。这种互动模式的根源在于俄罗斯作为亚太空间“他者”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无论对于亚洲国家还是对于俄罗斯自己都是根深蒂固的,这也使得俄罗斯不可能以亚洲身份有效地融入亚太安全体系。

于是,在不同历史时期,随着俄罗斯与亚太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它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两个相对平行的状态下摇摆。在俄罗斯综合国力强大的时候,它能够成为闯进亚太空间之内的破局者,以凌驾于亚太国家之上的力量干预亚太安全事务,平衡亚太国家之间的关系。但在其国力衰落时,它就只能成为在亚太空间边缘徘徊的“奥涅金”,虽存在于体系范畴之内,却无法融入体系的发展进程之中,在实践中很容易被忽视,从而成为那个“多余的人”。

冷战结束后的俄罗斯联邦正是陷入这样的困境之中,在国家力量大幅下降,欧亚空间与亚太空间的力量对比愈发失衡的局面下,俄罗斯逐渐滑向亚太安全体系的边缘位置,其国内的亚太战略出现了严重的摇摆。为了摆脱“奥涅金”式的窘境,俄罗斯知识精英在思想理念和实践探索方面做出了各种尝试和努力。然而,在当前俄罗斯综合国力处于历史低位的条件下,国家层面的战略设计能否突破历史逻辑的限制和结构性障碍的干扰,在体系层面发挥积极影响,则仍需等待时间的检验。